

天津“济宁会馆助洋碑”溯源

赵耀双

明清时期的天津，凭着河海之利，不仅是京师门户、畿辅重镇，更成为北方的商业大都会。各地商贾云集，货栈林立。随着商业的发展，一种地域性的公益组织——会馆，开始出现。天津会馆之始，可追溯至清康熙时浙江人在原镇仓关王庙旧址修建的乡祠。

山东会馆在天津设立较晚，而作为同为运河沿岸大码头的山东济宁，很早就在天津设立了会馆。据《天津事迹纪实见闻录》：“山东济宁会馆在北门外迤西崇福庵内，需费系该府、州二属官商捐助。”1989年，天津市红桥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在位于小伙巷粮店街的济宁会馆旧址内，征集到石碑两方。其中一方文字漫漶严重，但有明确纪年为“康熙丙戌”，即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另一方碑，据《天津市红桥区碑石铭刻辑录及释文》一书：“《济宁会馆助洋碑》为山东同乡会所立，立碑具体时间不详……石碑为嵌墙碑，高68.5厘米、宽71厘米、厚6.4厘米。碑文楷书。”

该书立碑时间不详，是因碑文没有明确时间落款。但此碑文字清晰，记载了当年修缮济宁会馆、相关人员捐赠钱款的数量和捐款用途的详细开支。笔者拟根据捐款人员情况，对立碑时间做一考证。为便于行文，将部分碑文摘录于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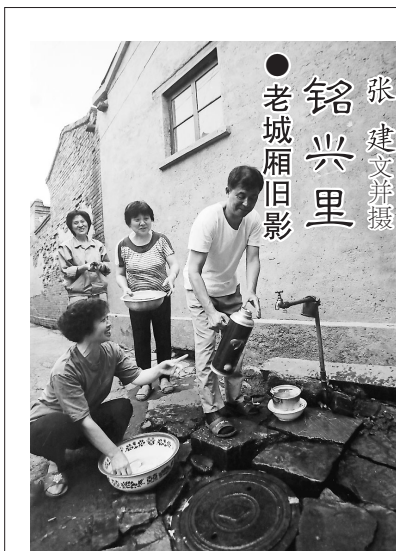
收入捐款数目列后：新总理翼青助洋伍百元；褚督办蕴山助洋伍百元；潘居士对免助洋肆百元；熊省长润丞助洋壹百元；周道尹敬甫助洋叁百元；吴道尹崑山助洋壹百元；曹县长少坤助洋壹百元；谭处长淞艇助洋壹百元；张统领汉臣助洋捌拾元；王道尹慕周助洋壹佰元；王司令景韩助洋叁拾贰元；刘处长韵樵

助洋捌拾元；庄先生乐峰助洋壹百元；吕会长静之助洋捌拾元；骆先生千堂助洋壹百元；黄先生深父助洋壹百元；李处长西亭助洋捌拾元；郭先生捷三助洋伍拾元；刘先生锡三助洋伍拾元；以上共收现洋贰千玖百伍拾贰元正。

碑文中“褚督办蕴山”，即奉系军阀褚玉璞，其于1929年9月在山东被杀。另一位“周道尹敬甫”，即周仁寿。1924年任胶东道尹兼烟台交涉员，1929年升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据二人的卒年，此碑建立年代应不晚于1929年。而褚玉璞是在直鲁联军打败国民军后，于1926年3月被当局任命为署理直隶军务督办的。根据碑文“督办”的尊称，此碑年代不会早于1926年3月。又据1926年9月19日《大公报》载“保护济宁会馆”消息称：“天津县公署昨致警察厅函略云：‘迳启者：案准，济宁会馆值年潘守廉等稟称，查济宁会馆前因年久颓废，募款重修，曾经呈请布告照料弹压在案。今工已告竣，又经县长补发红契，而济宁会馆之根基巩固矣……’”因碑为嵌墙碑，立碑一定在工程全部告竣之前。因此该碑镌刻设立时间当在1926年4月至9月之间。

《大公报》新闻中提到的济宁会馆值年潘守廉，即碑刻中的“潘居士对免”。潘是山东微山县人，其时正寓居天津。

1927年初，其主修的《济宁直隶州续志》刊刻出版，赞助人即为靳云鹏、熊炳琦，也就是碑中的“靳总理翼青”和“熊省长润丞”。靳云鹏两次出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晚年在天津英租界做寓公。其旧居在今四川路2号，现为天津市文物交流中心。熊炳琦，山东济宁人，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炮兵科和参谋学堂，曾任山东省省长。去职后，熊炳琦在天津经营实业，投资经营天津利中酸厂。潘守廉曾组织山东旅津人士成立“鲁省灾赈协会”并在南市召开大会，支援救助家乡灾情。碑刻中最末的捐款人“刘先生锡三”，则是天津著名老字号“盛锡福”创始人。刘是山东省掖县人，早年在美商美清洋行当职员，1911年，与他在估衣街归贾胡同南口合开盛聚福帽庄，后为独资经营，将商号更名为盛锡福帽庄。碑刻中非山东籍的“庄先生乐峰”，则于1927年，在英租界创办了第一所华人学校“天津公学”，即今之耀华中学。



位于老城里，东起立生油铺胡同，西至骆家胡同，西段分支至北不通，南侧通向熙临里，长约70米，宽约2.5米。清光绪七年（1881）商人姚金铭在此置地建房形成胡同，取名“铭兴里”。巷内住宅均为普通灰砖平房。照片摄于2003年7月。

“直沽渔隐”沈青来

章用秀

清代中期，有两位同名的画家，他们都叫沈铨，其中一位是吴兴人，字衡之，号南苹；另一位是天津人，字师桥，一字季掌，号青来。二人合称“南北沈”。

天津的这位沈铨，人称“北沈”，主要画花卉，喜以古松、怪石、奇葩、异草为题材，偶尔也画山水。《墨香居画识》说他“山水师石田（沈周），花卉宗南田（恽格）”。《津门诗钞》则称：“青来善绘事，著色花卉，得张桂岩（张锡宁）所传，当时重之。”1808年其画《玉洞春花》，设色绢本色调清雅，款题为“嘉庆戊辰立春日抚元人赋色，天津沈铨”。铃“沈铨之印”“直沽渔隐”印。陆辛农说：“曾见其所画写意蔬果，率笔钩点，淡逸有致。”一些著录上评论其着色花卉，工丽艳雅，可与南田相比。

沈铨善弹琴，著有《六琴十砚斋读画记》。生平慕黄山之胜，曾偕程音田、莫葵斋裹粮同游，凡山中怪石、古松、奇花异卉，咸为图绘，无不逼肖；且著《黄山记游》，详记黄山之胜，因内容具体，被今人李一氓编入《明清人游黄山记钞》。沈铨于绘事外，尤擅篆刻，白文得汉人神髓，朱文仿唐官印，亦能酷似。津人唐商鱼说：“曾见沈青来印谱铅印本于仰古斋段字焦所。”

三河县志严修诗

吴裕成

1936年河北省《三河县新志·艺文志》选载教育家严修诗作多首，如《甲申除夕旅居三河感旧》、《癸巳冬日由三河还京途中作》等。

修志者特加按语：“公名修字范荪，咸丰十年庚申生于三河县段家岭。越三岁，壬戌回天津。年二十三岁中光绪壬午科举人，二十四岁癸未联捷成进士，入翰林。丙戌留馆，授国史馆编修。甲午授贵州提督学政，试毕回京，仕至学部侍郎。民国改建，历授度支部、财政部总长等官，皆坚辞不就，出东西洋，游历日本欧美各国。年七十卒于天津。道德文章，全国景仰，有如祥麟威凤，景星庆云，人谓今世严子陵，为民国高洁第一流，人信不诬也……”字里行间，透着崇敬。

咸丰八年（1858），英法联军侵略天津，严家“避寇”三河县五个年头。1860年严修生于三河。县志选录《杂忆儿时琐事漫成十三首》，严先生作于1915年。诗以“何人贻玉杖，吾翁夜入梦”两句开篇，并自注：“生余之前夕，吾父梦人赠玉杖，故名余曰玉珪。”这是一位教育家人生起始的故事，在三河。

天津机器局关防

曲振明

旧时官印也称“关防”。相传明初，地方布政司常持预盖官印的空白纸到户部报账，数据易被篡改、舞弊。朱元璋后改革印信制度：将方形官印改为长方形半印，上下各执一半，文书需拼合验对（勘合）方有效。取“关防严密、防范私用”之意，定名“关防”。

天津机器局的关防，历史上有三变。清同治六年（1867）四月，机器局开局，初用印文“军火机器总局之关防”。后由于机器局初建时机器设备不多，军火产量较少，“仅足供应天津驻防各军”，于是在同治九年（1870），改机器局印文为“总理天津机器局之关防”。随着内部工厂、设备扩充，以及军火产量、品种双增，天津机器局开始供应北洋水师、直隶、热河、察哈尔、奉天、吉林、黑龙江、西北边防各军和淮系各地驻军。光绪二十一年（1895），王文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认为机器局再用“天津”字样名实不符，拟请更名北洋机器总局，另刻印文：“总理北洋机器局之关防”。

名家提携 津门创奉调

刘万江

早年，魏喜奎驰骋京津曲坛，先后得到鼓界大王刘宝全、乐亭大鼓名家王佩臣、单弦名家曹宝禄、梅花鼓王金万昌、河南坠子名家董桂芝与程玉兰等多位名流指导和传授，她年龄不大，却博学广纳，学会多样曲种。学得多了，魏喜奎愈加感觉唐山大鼓曲调平直、节奏拖沓，演出效果温吞，就总想着要改改腔儿，有时私下哼唱便不由自主揉进些别的曲调。京津两地唯一会弹唐山大鼓的魏宝华，因怕妹妹魏喜奎改革了唐山大鼓，自己伴奏不好，失去挣钱机会，于是极力反对。有一天魏喜奎在场上唱了一句改革的腔儿，魏宝华下场后劈脸给她两巴掌，“三弦圣手”白凤岩一直鼓励魏喜奎改革，见状狠狠说了魏宝华一顿。为躲开白凤岩的支持，魏宝华匆匆带魏喜奎到天津演出，那是1943年初，魏

喜奎17岁。

考虑到法租界小梨园的观众中，文墨人居多，相声名家张寿臣建议：“唱文雅些的《忆真妃》吧！”果然，这次来津公演的魏喜奎更为大红大紫，也引起同台的“金嗓歌王”小彩舞（骆玉笙）的关注。骆大姐不仅对她的吐字发音进行指导，还对她改革唐山大鼓予以支持：“节奏可以紧凑些，再研究一两个高腔儿。另外，不要拿观众听熟了了的段子改，听主儿会觉得乱！”看威望极高的小彩舞也支持改革，再加上《369画报》记者之前撰稿说“唐山大鼓曲调没高没低，是‘撻地儿’的大路活”，魏宝华的态度也开始转变。恰京剧名角李万春正在北洋戏院演《八仙斗白猿》，魏宝华、魏喜奎受到启发，用传统鼓词《白猿偷桃》创作了一段改革步子较大的唐山大鼓，演出后挺受欢迎！小彩舞又建议：“你们多听听马宝山，他的大腔儿好，而且奉天大鼓和唐山大鼓接近，你们可以吸收他的

腔儿。”当时马宝山正在南市小书馆和电台说唱，魏喜奎数次讨教，并把新学的唱腔变化着用在新的段子里。有观众说魏喜奎唱得不像唐山大鼓了，但小彩舞鼓励魏喜奎：“不像怕什么的？！观众爱听就是认可，接着唱下去，改下去！”

1944年秋末，魏喜奎又临津门，遇到“白派”鼓王白云鹏。白老先生对这位后起之秀极为喜爱，不仅指导魏喜奎吐字归韵、手势身段，对于她改革唐山大鼓，更是鼎力扶持，帮她选择适合唐山大鼓演唱的题材，指点她提高唱词的文化水准、规范辙韵，还建议：“既然你唱的跟原来的唐山大鼓全不是一个味儿了，我看倒可以考虑改改名儿。”

1945年8月，魏喜奎返京后逐渐唱红了改革的唐山大鼓，并正式更名“奉调大鼓”。其实也可以说，“奉调大鼓”形成于魏喜奎的家乡天津卫。

津沽文丛

魏喜奎的津沽往事之五

